

王阳明生平事迹及其思想发展脉络

张新民

王阳明,名守仁,字伯安,学者尊称阳明先生。成化八年(1472)九月十日出生于浙江余姚,嘉靖七年十一月二十九日卒^[1]。《年谱》说他是晋光禄大夫王览后裔(王羲之即览之曾孙)。阳明高祖王与淮精研《礼》、《易》,曾著《易微》数千言,祖父王伦(?——1490)亦有《竹轩稿》、《江湖杂稿》行于世。父亲王华(1446—1522),人称龙山公,成化十七年(1481)进士第一名,历官南京吏部尚书。龙山公受绍兴山水佳丽,又为先世故居,遂自余姚往迁居之。阳明幼年在原籍生活,相传五岁尚不能言,十一岁随龙山公赴京师过金山寺时,却能豪迈赋诗,慧智惊人,并以学圣贤为第一等事,出语不凡。13岁母亲在京师病逝,居丧哭泣甚哀。15岁出游居庸关,慨然有经略四方之志,又欲献书朝廷,请纓靖难,龙山公斥为“狂”才停止。17岁前往江西娶亲,临行婚礼的那一天,他散步偶入铁柱宫,与道士谈养生方法,竟通宵相坐忘归,次日凌晨方被人找回。翌年携夫人诸氏归余姚,船过江西广信时,曾去拜访名儒娄谅(1422—1491),相互谈及宋儒格物之学。娄谅告诉他:“圣人必可学而至。”阳明深以为然,乃广读诸经子史,泛览辞章。21岁在家乡中举人,旋侍龙山公于京师,遍求朱子遗书读之,并在父亲官署中观竹“格物”,劳思致疾仍不得其理。于是对朱子颇有怀疑并随世改从辞章之学。

弘治五年(1493)与八年(1496),阳明两次会试下第,乃留情武事,读兵书,谈养生,有遗世入山之意。28岁中进士,观政工部,心情转趋激奋,向朝廷上“蓄材以备急”、“屯田以足食”等边务八事,言辞剴切。29岁授刑部云南清吏司主事,31岁以呕血告病归越,筑室阳明洞修习道家导引之术。33岁主考山东乡试,试录颇见经世抱负。旋改兵部武选清吏司主事,在京倡言身心之学,开始招收门人,讲学以立志成圣为宗旨。时人多目为立异好名,惟湛甘泉(1466—1560)一见定交,共以倡明圣学为事。

这一时期的王阳明,兴趣十分广泛。湛甘泉说他:“初溺于任侠之习,再溺于骑射之习,三溺于辞章之习,四溺于神仙之习,五溺于佛氏之习。”^[2]直到正德元年(1506)谪贵州龙场驿丞后,才真正浪子回家,归正于儒家圣贤的学问。他十五岁已能骑射,任侠性格一生都有表现,这使他颇有豪迈不羁、大心仁人的儒者气象,而有别于谨守规矩绳墨的一般拘拘陋儒。进士及第后又爱好兵法,演习过八阵法,关心朝政边事,建言意气风发,识者当时就知道他有远志。“豪雄”与“儒雅”成为他一生个性气质的两大重要特点。王门后学很少出拘陋俗儒,这当然与阳明个人及其学术品格的影响有关。

王阳明在贵州龙场的悟道,是他一生最重要的转折点。正德元年(1506)武宗初政,宦官刘瑾弄朝政,南京科道戴铣等上疏请罢刘瑾,忤旨入狱。阳明以兵部主事小职,不顾刘瑾狡残凶狠,仗义直言,抗疏营救,结果遭害下狱,廷杖四十,谪贵州龙场驿丞。翌年夏赴谪至钱塘,刘瑾密遣心腹尾追刺杀,阳明自度难免一死,乃假弃冠履,托言投江,躲过追踪。脱险后曾有诗记当时心情:“险夷原不滞胸中,何异浮云过太空?夜静海涛三万里,月明飞锡下天风”^[3]。

正德三年(1508)三月,阳明抵达龙场(今修文县境)。龙场其地,万山环抱,荆棘丛生,蛊毒瘴疠,语言不通。在这种艰苦孤寂的环境中,他自计一切得失荣辱都能超脱,只有生死一念尚在心中萦绕,于是筑石墩自誓说:“吾惟俟命而已!”在静默中思考人生的究竟,“因念圣人处此,更有何道?忽中夜大悟格物致知之旨,寤寐中若有人语之者,不觉呼跃,从者皆惊。始知圣人之道,吾性自足,向之求理于事物者误也”^[4]这就是有名的龙场悟道,也是他重新开辟精神天地的开始。有关这次悟道的经过及意义,阳明后来也有述及:“谪官龙场,居夷处困,动心忍性之余,恍若有悟,体验探求,再更寒暑,证诸五经四子,沛然若决江河而放诸四海也。”^[5]可证《年谱》的说法,决非后人的向壁虚构。

关于龙场悟道,今人多有斥为神秘者。其实这是不了解他长期艰苦求道的结果。阳明哲学的中心问题是

成德成圣,实现自己的人格理想。这在11岁时就有了表现[6]。弘治元年(1488)娄谅“圣人必可学至”的期许,也增强了他在现实人生中“成圣”的信心。然而如何在有限的生命中成就“圣贤境界”,却是龙场悟道前始终困惑着他的根本问题。在朱子哲学为官方正统之学的时代氛围下,他最初是按宋儒向外格物的办法,先读书积累经验知识(博见),再“诚意、正心、修身”,做“尊德性”的功夫。但是这种做法给阳明带来的却是巨大的紧张和重压——经验界的知识无穷无尽,如果人作为时空中的有限存在先要穷尽经验界的知识,然而才有“成圣”的可能,“成圣”岂不是空话?因此,阳明面对的问题实际是,人如何才能超越时空的限制,使生命毫无障碍地进入无限,获得“成圣”的主体自由?著名的亭前格竹故事,便是一个典型的例证。以七日的精力尚不能穷格竹子的道理,又何能在有限的生命中尽知天下事事物物?[7]这种有限与无限的内在紧张与冲突在以后仍有表现,《年谱》说他20岁时,“自念辞章艺能不足以通至道,求师友于天下又数不遇,心持惶恐;一日读晦翁上宋光宗疏,有曰:‘居敬持志为读书之本,循序致精为读书之法’。乃悔前日探讨虽博,而未尝循序以致精,宜无所得;又循序,思得渐渍浹洽,然物理吾心终判而为二也。沉郁既久,旧疾复发。益委圣贤有分”[8]。“心持惶恐”与“沉郁既久”,最能点出这种内在的紧张与重压,外在的物理探求与内在的精神提升始终不能统一,宋儒循序格物的路子反而加重了“圣人情结”引起的内在焦虑。强烈的精神渴求迫使他必须另寻新的安身立命的人生之路。

这种有限与无限的内在紧张与冲突,也可用来说明他对辞章、道教、佛教的态度。钱德洪以“三变”概括阳明学道经历:“少之时驰骋于辞章,已而出入于二氏,继乃居夷处困,豁然有得于圣人之旨,是三变而至于道也。”[9]辞章之学阳明20岁以后即以为不能帮助进入“圣域”,慨叹“吾焉能以有限精神为无用之虚文”[10]“有限之精神”指人的内在生命的有限性,换句话说,即有限的生命如何能虚掷于玩弄光影的辞章之学。道教与佛教之所以吸引阳明,正是因为前者既有一套长生久视之道,可缓解内在生命有限带来的紧张焦虑,又有“清静”、“逍遥”等齐生死无始终的超越层面,能安顿形上之精神;而后者出离生死、如实观空的智慧更是当下就能消解有限与无限的对立冲突,在妄执尽去的超越境界中,彻入生命本有的圆融真实。从这一意义出发,阳明后来才肯定“老、释于圣人之道异,然犹有自得也”。如果只是以有限的生命从事无益于精神的章句勾琢之学,不知反求于本心本性,甚至认为“圣人之道劳而无功,非复人之所可为”,那就是使圣人之学放废的大患,害处或许还在老释之上。因此,阳明自谓:“居今之时而有学仁义,求性命,外记诵辞而不为者,虽其陷杨、墨、老、释之偏,吾犹且以为贤,彼其心犹求以自得也。夫求以自得,而后与之言学圣人之道。”[11]

但是道释与儒家圣人之学毕竟有根本的歧异,尤其在人生社会伦理责任的自觉承担方面。所以站在儒家圣学的立场上,他对道释两家的形上超越智慧层面颇能同情地了解,而一旦落入人伦日用的社会生活层面就会引起不满和批判。道教长生不死与飞升点化的簸弄精神,诡异奇骇固不必说,即使佛教以心性为本体的形上超越智慧,在阳明看来,也不免过份滞执于虚寂,违背人的活泼本性,丧失儒家仁道生生不已的机趣,不能向外发用开出“外王学”的人类历史文化事业。《年谱》记载了一个非常能说明问题的生动实例。阳明31岁时,曾经往来于杭州、南屏、虎跑等禅宗传法道场,有一僧人坐关已经三年,在禅定境界中长期不语不视。阳明大声喝问:“这和尚终日口巴巴说什么?终日眼睁睁看什么?”僧人猛然惊起。阳明问他的家人,僧人说:“母亲尚在”。又问“起念否?”答:“不能不起”。阳明当即指出受亲乃是人的本性,娓娓喻之,终使僧人流泪感谢。第二天再问僧人去向,僧人早已离寺返家了。[12]阳明以禅门机锋说儒家道理,当是儒佛争辩的上乘有趣公案。

如果比较一下阳明对老释的外在批判立场,我们就会发现,他对宋儒格物学的批判只能是儒学内部的批判。前者尽管是建构自己心学体系的增上缘,却不能不是圣学之外的“异学”。后者虽然屡遭怀疑,却始终是提供正面思想资源的“正学”。因此,阳明出入老释只是暂时性的精神歧出,而对宋学的怀疑与批判则要到谪居龙场后才能根本完成。尽管如此,龙场之前仍可看到其思想转变的种种倾向。弘治十四年(1501)阳明三十岁时,在安徽九华山岩洞与道人讨论人生最上乘境界,道人所说“周濂溪、程明道是儒家两个好秀才”,已为启发他在儒家内部从朱学转向提供了契机。34岁在京师讲授圣学,他所倡导的正是与朱学不同的“身心之学”。与陈白沙弟子湛甘泉交友对他影响尤大,自谓“某幼不同学,陷溺于邪僻者二十年,而始究心于老释。赖天之灵,因有所觉,始乃沿周、程之说求之,而有得焉,顾一二同志之外,莫予翼也,岌岌乎仆而后兴。晚得友于甘泉湛子,而后吾之志益坚,毅然若不可遏,则予之资于甘泉多矣。甘泉之学,务求自得者也。”[13]这一切都为龙场悟道之后以儒家精神价值为本位,创造性地综合道释两家的智慧,从而建立自己的心学体系作了思想上的准备。

然而阳明真正开始走出朱学的束缚,毕竟要到谪居龙场之后。在出生入死的边际实存境况下,长期围绕心中的有限无限问题必然再次紧张爆发。因为死亡的光照既使人的时空有限性最大程度地彰显,道德自我的无限超越也就显得越发迫切。阳明当时自述在龙场的情形:“瘴疠蛊毒之与处,魑魅魍魉之与游,日有三死焉;然而居之泰然,未尝以动中者,诚知生死有命,不以一朝之患而忘其终身之忧也。”[14]后来又回忆说:“学问功夫,于一切声利嗜好,俱能脱落殆尽,尚有一种生死念头,毫发挂带,便于全体有未融释处。人于生死念头,本从生身命根上带来,故不易去。若于此处见得破,透得过,此心全体,方是流行无碍,方是尽性至命之学。”[15] 阳明所说的“终身之忧”,出《孟子·离娄篇》,意指儒家的终极关怀。在超越日常世俗的功利得失忧虑,摆脱一切声利嗜好及权位荣誉,直接面对生命的终极意义与终极存在之际,纯智、纯理、纯善的本真心性立刻呈现,人当下就获得“圣道吾性自足”,或“人心即天理”的自我觉醒。这一道德自我的觉醒一方面使有限生命当下就进入无限,彰显出任生死、超生死的绝对主体自由,消解了向外求理等一切有限、无限对峙引起的紧张焦虑;一方面也使人无可逃避、无可推卸地承担起人生及人类总体的责任与义务,自觉地履行本心本性赋予人的成圣成贤的道德使命。因此,龙场悟道,阳明学问宗旨始决定性地转向内在精神,归于心性正学,进入大道坦途。而阳明学问宗旨,亦必发展到龙场悟道,方真正在心灵上起一大自觉,得精神之大自由大自在。恰如黄河长江,千山万壑曲折,自此浩浩荡荡,一泻千里,直奔大海,直入苍穹。

龙场悟道后,阳明用自己的生命真正契入以孔孟为代表的儒家精神传统。他以自己的实存体悟默证于五经,无不吻合,又以为先儒训释未能尽是,乃就记忆所得为之疏解,成《五经臆说》一书[16]。正德四年(1509)38岁,又悟知行合一,在向上提升以实现圣贤境界的同时,又不忘向下开拓以求具体的道德践行,并在当地创办龙岗书院,应提学副使席书之聘主讲贵阳文明书院,授“知行合一”之旨。“诸生环而观听者以数百,自是贵阳人士始知有心性之学”[17]。甚至周围的少数民族,对他的讲授也无不心悦诚服,相处融洽亲敬。由贵州宣慰使安国享铸刻的“阳明先生遗爱处”七个大字,至今仍完好保存于龙岗山阳明洞,便是明证。

正德五年(1510)三月刘瑾伏诛后,阳明升江西庐陵县知县,在任七月,为政不事威刑,惟以开导人心为本。十一月入京朝觐,旋调南京刑部主事、吏部验封清吏司主事,问学受业者日多,乃随时点化,务期发明圣学。正德七年升南京太仆寺少卿,与弟子徐爱同舟归越省亲,途中痛论《大学》宗旨,徐爱录为《传习录》卷首十四条。次年至安徽滁州督马政,从游弟子愈加增多,教以静坐入手方法。正德九年升南京鸿胪寺卿,与门人日夕聚讲,要求学者存天理,去人欲,为省察克治实功,声名大振。正德十一年经兵部尚书王琼举荐,升都察院左金都御史,巡抚南赣门漳等处,他以招抚为主,用兵为辅之法,仅短短七月,即迅雷般取得军事胜利,表现出卓越的将略才能。又将学术与事功打成一片,化政治理念为制度现实,办社学,立乡约,修书院,改税法,以求化导人心,巩固秩序。自谓“莫倚谋功为上策,还须内治是先声;功微不愿封侯赏,但乞鬻输绝横征”[18]。正德十三年六月,升都察院右副都御史,至是全军上下才稍得休整。于是修建濂溪书院,为诸生指示入道方法,“武夫介士执兵环立,蹀躞担镫之人千里远至。长揖上坐,一言开悟,终身诚服,风教四被,讫于江表岭南。”[19] 又发明《大学》本旨,刊刻古本《大学》及《朱子晚年定论》。《传习录》一书(即今本《传习录》上卷),也在这一年由门人薛侃刊行。

正德十四年(1519)六月,阳明受命勘查福建叛军。途经南昌丰城,闻宁王朱宸濠叛乱,遂匿渔舟潜回吉安。一面向朝廷上疏报告事变,一面传檄揭发宸濠罪状。他未奉成命,即主动勤王,倡义平乱,并利用朱宸濠精锐悉攻安庆,南昌守备空虚的机会,一举收复藩府,解除安庆受围之急。旋又设伏迎战藩军于鄱阳湖,生擒藩王朱宸濠。前后仅35天,一场号称拥有十万大军的藩乱即被平定,而阳明真正用兵不过旬日。其神速如此,古今罕见。

不意平乱捷音上闻,给立功者带来的却是祸难。原来宸濠初谋反时,阳明曾上疏说:“今天下之覬觐,岂特一宁王;天下之奸雄,岂特在宗室,……罢出奸谀以回天下豪杰之心,绝迹巡游以杜天下奸雄之望”[20]。此遂引起与宸濠有勾结的阉党忌恨。而明武宗好大喜功,又一意孤行,借口亲征南游,左右宦官竟劝阳明放出宸濠,以便让武宗生擒显功。阳明担心百姓困苦已极,难以再次遭受干戈纷扰,断然拒绝。宦官惧怕揭发勾结宸濠罪状,反诬阳明先与宁王通谋,虑事不成才起兵邀功。一时恶言四起,危疑汹汹,祸机四发,弟子冀元亨蒙谤难辩,竟冤死狱中。阳明身陷谗嫉,处境艰难,不胜忧愤,惟自信天德良知昭昭自在,泰然超越于生死患难之外,自言经宁藩之变,“益信良知真足忘患难,出生死”。“致良知三字,真圣门正法眼藏,往年尚疑未尽,今自多事

以来,只此良知无不具足。譬之操舟得舵,平澜浅濑,无不如意,虽遇颠风逆浪,舵柄在手,可免没溺之患矣。”[21]

阳明在百死千难的实存体验中,既得益于生命或人性本有的良知真谛,遂在南昌正式以“致良知”作为启发学者提升精神境界的教学方法。这一年恰值辛巳年(1521)他满五十岁,标志着漫长心路历程又进入了新境界。钱德洪总结阳明龙场悟道之后的成圣教法,也以“三变”概括说:“居贵阳时,首与学者为‘知行合一’之说;自滁阳后,多教学者静坐;江右以来,始单提‘致良知’三字,直指本体,令学者言下有悟;是教亦三变也”[22]。德洪所述,乃是启发学者修身成德的三种方法,其中致良知教统摄了“知行合一”与“静坐”的道理,应是阳明晚年教法的定论。三种方法并非相互否定的关系,“静坐”特别是“知行合一”作为成圣的立教功夫,即使在阳明晚年思想中也仍有重要位置,只是致良知将本体与功夫、动与静、本与末、内(主)与外(客)、有与无融为一体,合成一事,所以依阳明,“致良知”才是圣门正法眼藏,代表了他的思想学说的高峰,是长期精神探寻的结果。

与朱子学说有较多主知的成份不同,阳明学说更富于体验的色彩。就个体生命的实存体验而言,他的思想的每一发展、提升、充实、飞跃,都得力于他对自身深层心性源头活水的深刻体验,来自内在精神力量的强大自觉,更是人格生命活泼泼的自然流露和展现。因此,作为一种颇有东方文化特点的体验之学,“良知”说的提出乃是阳明思想发展脉络的必然逻辑结果。另一逻辑路线则是由己推人,直悟人人同具良知,成圣的潜在性与可能性都在己不在人,或者说作为成圣本体根据的良知发用,无论在人在己都有赖于个体实存体验的心性觉醒。这就为道德人格的挺立和实践开辟了一个广阔的主体世界。阳明生命与学问融然化洽,道德与事功表里无间,他的存在本身就开启了重要的人生方向。从外在社会环境的实存感受来说,明代是中国皇权专制的高峰时代,尤自朱元璋废相后,阉党肆意弄权干政,士人多遭压抑摧残。阳明一生既屡受其害,必然痛感道德理念与专制政府对立的紧张。按照余英时先生的分析,良知为人人之所以同具,又是“知是知非之心”,这样一来,原本是皇权专制下的“天下是非一本于朝廷”,现在是人人依良知判断是非,原本是外在的道德强加,现在是主体的自觉抉择,决定是非之权已在暗中从朝廷还给每一个人,外在的客观制度规范也变成了主体的自我差别。正是在这一意义上,致良知教实涵有深刻的抵抗专制的意义。阳明一生敢冒天下之非难诋毁,虽百死千难,仍遑遑然不忘社会层面上的讲学,实际正是由政治转向社会,为儒学开拓新的空间,他是以避开政治的曲折方式来抵抗专制的[23]。因此,阳明一生思想学说的发展,也表现了他在皇权专制压抑下,对人格气节和精神境界的固守和坚持。他自己说:“某于此良知之说,从百死千难中得来。”只要对当时的政治危疑形势稍加分析,就能知道这句话所蕴涵的真实份量。他是在对人性与现实的双重深刻察照与严肃践履中不断发展自己的思想学说的。

就在阳明揭出致良知教的那一年,武宗病逝,世宗即位。他的政治危机才稍得舒缓。阳明依功被封为新建伯,仍遭朝廷大臣忌恨排斥。嘉靖元年(1522)龙山公卒,阳明在越守父丧,从此赋闲授徒,各地弟子争趣纳拜,环坐而听者达三百余人。阳明乃依良知说因方设教,畅发《大学》万物一体之旨,学问、思想、境界及教学方法都更加圆融和完善。嘉靖三年宴门人于天泉桥。同年,南大吉取薛侃首刻《传习录》,增补续刻为五卷(增补部分即今《传习录》中卷)。嘉靖六年,邹守益录阳明文子请刻,遂在广德刊行《文录》四册。这一时期,阳明学术思想竟被下诏禁为“异学”,但是他仍坚信“道”的兴废不容泯灭,依然写下大量阐发哲学思想的论学书信。

嘉靖六年(1527),阳明受命兼都察院左都御史,带病出征广西思州、田州。临行前与门人钱德洪、王畿论道于天泉,以“四句教”概括思想学术宗旨。这就是学术史上著名的“天泉证道”。阳明在广西定以兵机,感以诚信,迅速平定一方之乱。翌年班师奏捷,他病疾加重,竟卒于江西南安归途,年57岁。临终遗言为:“此心光明,亦复何言”八字。士民闻丧,远近遮道,沿途哭送,直至越中。

阳明一生,他的人格境界、生命气象以及出处建功事迹,成功地践履了儒家“内圣外王”理想对人生的要求,也是“知行合一”精神的存在见证。对他的思想学说,欣赏赞叹者有之,批判呵责者亦有之,不仅出现在当时,而且不绝于后世。然而诚如郑端简所说:“王公才高学远,兼资文武,近世名卿,鲜能及之。特以讲学故,众口交訾,盖功名昭揭,不可尽盖覆。唯学术邪正,未易铨测,以是指斥,则谗说易行,媚心称快尔。”[24]对阳明及其学术的争论,今天已不限于讲学一端,但仍可将这段话迳来作为我们重新评价他的生平事功及思想学说的一个原因。

[1] 按嘉靖七月十一日二十九日当公元1529年1月10日,陈荣捷已有明确考订,检陈垣《中西回史日历》可得,今人著作多有作1528年者,均误。

[2] 湛甘泉《阳明先生墓志铭》，《王阳明全集》(以下简称《全集》)卷三十八，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12版，第1401页。

[3] 《泛海诗》，《全集》卷十九，第648页。

[4] 《年谱》，正德三年春条，《全集》卷三十三第1228页。

[5] 《朱子晚年定论序》，《全集》卷三，第127页。

[6] 《年谱》成化十八年条：“(阳明)尝问塾师曰：‘何为第一等事？’塾师曰：‘惟读书登第耳。’先生疑曰：‘登第恐未为第一等事’。龙山公笑曰：‘汝欲为圣贤耶！’”见《全集》卷三十三，第1221页。

[7] 格竹之事，《年谱》载之，阳明自己亦明白说之，当属可信。《传习录》下载阳明之言：“众人只说格物要依晦翁，何曾把他的说法去做？我着实曾用来。初年与钱友同论做圣贤，要格天下之物，如今安得这等大力量？因指亭前竹子，今去格看。钱子早夜去穷格竹子的道理，竭其心思，至于三日，便致劳成疾。当初说他这是精力不足，某因自去穷格。早夜不得理，到七日，亦以劳思致疾，遂相与叹圣贤是做不得的，无他大力量格物了。及在夷中三年，颇见得此意思，乃知天下之物本无可格者。其格物之功，只在心身上做，决然以为圣人人人可做到，便自有担当了。”阳明的话反映了向外格物对成圣理想的最初冲击，这种冲击必定在内心造成巨大的紧张和重压。不过，他的说法显然是对朱子的误读，尽管这种误读有助于重新建构理论。朱子虽然有主知重智的一面，但目的仍是实现内在人性，提升精神境界。所以朱子也讲“心理合一”、“天人合一”，反对“穷神索至”。

[8] 《年谱》弘治十一年条，《全集》卷三十三，第1224页。

[9] 钱德洪《刻文录叙说》，《全集》卷四十一，第1574页。按钱氏“三变”说与甘泉“五溺”说，并无根本歧异。

[10] 《年谱》弘治十五年八月条，《全集》卷三十三，第1225页。

[11] 《别湛甘泉序》，《全集》卷七，第230、231页。

[12] 《年谱》弘治十五年八月条，《全集》卷三十三，第1226页。

[13] 《别湛甘泉序》，《全集》卷七，第231页。

[14] 《答毛宪副》，《全集》卷二十一，第801页。

[15] 《传习录》下。以下凡引《传习录》，均不再注明出处。

[16] 钱德洪《五经臆说》序，《全集》卷二十卷，第976页。

[17] 《贵阳府志》卷五十六。

[18] 《回军九连山道中短述诗》，《全集》卷二十，第750页。

[19] 邵廷采《思复堂文集》卷一，《明儒王子阳明先生传》。

[20] 《奏闻宸濠伪造檄榜疏》，《全集》卷十二，第396页。

[21] 《年谱》，正德十六年正月条，《全集》卷三十四，第1278—1279页。

[22] 钱德洪《刻文录叙说》，《全集》卷四十一，第1574页。

[23] 余英时《现代儒学的回顾与展望》，《中国文化》1995年11期。余氏举《传习录》中阳明所说：“夫学贵得之心。求之于心而非也，虽其言出之于孔子，不敢以为是也。”以为这句话是“良知是个是非之心”的具体例证。尚可以补充阳明另一段话：“夫舜之不告而娶，岂舜之前已有不告而娶者为之准则，故舜得以考之何典，问诸何人，而为此邪？抑亦求诸其心一念之良知，权轻重之宜，不得已而为此邪？武之不葬而兴师，岂武之前已有不葬而兴师者为之准则，故武得以考之何典，问诸何人，而为此邪？抑亦求诸其心一念之良知，权轻重之宜，不得已而为此邪？”(《传习录》中)足证判断是非的标准不在外在的权威和传统，而在以良知为依据的主体内在性自我。

[24] 《思复堂集》卷一，《明儒王子阳明先生传》引。

作者单位 贵州师大历史研究所(550001)

责任编辑 张祥光